

(美) 魏斐德——著
王小荷——译

門

Strangers

大门口的 陌生人

*Strangers
at
the
Gate*

1839—1861年间
华南的
社会动乱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Frederic Wakeman, J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美) 魏斐德——著
王小荷——译

大门口 的 陌生人

*Strangers
at
the
Gate*

1839—1861年间
华南的
社会动乱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门口的陌生人: 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 (美) 魏斐德著; 王小荷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133 - 1531 - 9

I. ①大… II. ①魏… ②五… III. ①鸦片战争 (1840 ~ 1842) - 研究②广东省 - 地方史 - 1839 ~ 1861 IV. ①K253.07②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0549 号

大门口的陌生人: 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美) 魏斐德 著 王小荷 译

策 划: 刘丽华

责任编辑: 陈万龙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 - 88310888

传 真: 010 - 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 - 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0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一版 201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3 - 1531 - 9

定 价: 3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言	1
第一部分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1839—1841）	
第一章 三元里事件	8
第二章 广东的团练	21
第三章 士绅与三元里	30
第四章 我们中的汉奸	46
第五章 我们与他们	59
第二部分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1842—1849）	
第一章 忠良还是叛逆？	70
第二章 进退两难	81
第三章 黄竹岐：时间到了	94
第四章 1849年的胜利	106
第三部分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	
第一章 阶级与宗族	128
第二章 华南的秘密社会	138

第三章 广东与太平天国叛乱	149
第四章 收紧圈子	156
第五章 红巾叛乱	165
第六章 清洗	178

第四部分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1861）

第一章 广州被占	188
第二章 广东团练总局	195
第三章 抵抗运动	200
第四章 离去	208

附 录

一 人口压力	214
二 书院与社学	216
三 “房产危机”	221
四 一些经济问题	223
五 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	226
六 红巾叛乱	229

本书主要人名译名对照	235
征引书目	237
译后记	255

导言

太平天国叛乱（1850—1864）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人们如果穿越曾经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河道里“充斥尸体，污物凝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50万居民。15年的屠杀与饥谨，使中国付出了1000万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

这一内战的损失超出了历史想象的界限。更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因为耻于承认他们与福楼拜的《简单的心》^①中的主人公相似，而没有对这样的大屠杀表示太大的兴趣。诚然，太平天国叛乱带来的破坏，是一剂马尔萨斯式的中和药，在随之而来的恢复时期，使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一再被引向这次叛乱却不是因为这一点。历史学家们被吸引，是因为太平天国叛乱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岭。从纵向看，这个民族的近代史就起源于这些暴乱的年头。首先是帝国分解为一个地域单位，然后是王朝的削弱、被推翻，最后进入军阀混

^① 《简单的心》，福楼拜的一本小说，写一仆人老实而不聪明，虽饱受人间的痛苦，但不能深刻地了解世事原委。——译注

战的年代。但是，当我们接受这种传统的历史划分时，就出现了混乱。这次叛乱到底是一段历史的终点，还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它仅仅是中国常见的农民叛乱的新形式，还是那种在日后的岁月中塑造或改变中国的新力量的体现？

谈论停滞的中国已经不时兴了。人们继续去努力区分不同类型的王朝更替，或者强调长期的、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变迁。对那些描述王朝更替的儒家历史学者或是无文化的农民而言——他们相信在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任何一个皇族都命该灭亡——王朝的循环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是这样，所以也总会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进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循环、往复。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象。旧的循环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显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全球历史，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欧洲、中东、亚洲、非洲、美洲，各自都是汤因比^①所称的“文明的历史单位”。历史上曾经有过交往，甚至冲突——地中海世界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每一地区就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区域。罗马派往汉王朝的使臣，甚至到唐王朝去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也只是前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才与地中海世界一度有过真正的交往。明朝（1368—1644）则有效地断绝了这种联系。直到18世纪，这个东亚最大的大陆国

^① 汤因比（Toynbee），英国历史学家，以研究世界文明史著称。——译注

家在政治上、礼仪上都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疆域之内。所有外来的文化都被视为是野蛮的，既不值得重视，也不值得惧怕。

但是，在这段湮没无闻的时段中，一个新的全球性历史正在形成。一个欧洲船长为运送香料、丝绸而航行 16000 海里已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英国、荷兰的船主们统治半个地球以外的地区也成为可能。克莱夫在普拉西的胜利^①，标志着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三世界”的欧洲化——的开始。

亚洲破晓，墓碑显露，
碑上什罗浦郡^②人的姓名可辨；
尼罗河水泛滥，
旁边就是来自塞佛河^③的人的遗蜕。

与此同时，欧洲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到 1768 年时，珍妮纺纱机及阿克莱特纺织机在英国被用于纺棉。15 年之后，柯特的炼铁法把生铁精化。到 1835 年，甚至法国落后的冶金工业，也生产出了三十多万吨生铁。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把蒸汽机引进给受苦的炼钢工人们。无论好坏，地球正在变为一个新的、经济上不同的工业世界。

而中国在时间、空间上都与这个人类革命的进程相隔绝。这种孤立状态延续的时间越长，当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历史单位

① 克莱夫 (Robert Clive)，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奠基者，被称为“印度的克莱夫”；普拉西 (Plassey) 是孟加拉地区一地名。1757 年，英国殖民军在克莱夫的率领下击败孟加拉王公军，史称“普拉西之役”。此役确立了英国对孟加拉的统治，是其征服印度之始。——译注

② 什罗浦郡 (Shropshire)，18、19 世纪英国最大的工业地区。——译注

③ 塞佛河 (Severn)，英国最长的河。——译注

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时，它所感到的震动就越剧烈。这一突然打击的戏剧性过程是尽人皆知的——林则徐对外国鸦片的查禁、首次海战、英国的进攻与封锁。简言之，鸦片战争（1839—1842）使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

这样，两个进程（内部的和世界的）汇合，使中国的状况变得更为混乱了。在历史进程的变化中，熟悉的旧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未被认识的意义。传统衰落的一个征象可以预示整体的变化。由此，人们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含义也产生了疑惑：叛乱或革命？传统的还是新的？

近代史学家们曾用四种主要论点来表明太平天国造反者不只是在外表上异于传统的盗匪。第一个假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了的公式。它认为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造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开埠各口的苦力和运茶船工，而这些人由于鸦片战争陷于失业。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参加，赋予了叛乱以一种真正的原始革命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最后镇压了叛乱的士绅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的。过去，地方士绅在任何时候的叛乱中总可以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正掌权的王朝，也可以怀着攀龙附凤的希望，同有成功之望的叛乱首领达成协议。而这一次，太平天国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儒学的攻击，使士绅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为了保存自己，他们不得不宁愿支持一个虚弱的王朝，也不愿去支持一个威胁社会的革命运动。

第三种，也是最巧妙的一种，认为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新式的统治者。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不只是简单地认为满族人已失去了天命，而且还接受了一种外来的资源以证明他们超凡的合法性；这一资源就是天堂中的上帝，它取代了孔学的权威。

最后，许多人认为，叛乱者的公有财产制度及千年王国说，

代表着一种新型的乌托邦，而它对中国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外来的，而且也只有洪秀全所用的基督教条文中才能找到。

当然，对于这四个论点的每一点，都有着反驳意见。首先，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流氓无产者，不过是中国传统说法中的“无业游民”。对于士绅的论点，可以用有功名的人中也有太平天国支持者的事实加以反驳；或者说，对地方上反对太平天国叛乱的情况，了解还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这一空泛的论点。对第三种观点的反驳是这样的：在天命和超凡的合法性之间进行比较，只适用于叛乱的后期，即建立王朝时期；并且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狭隘的语言学分析上的，它忽略了太平天国统治的其他的、传统的方面。最后，洪秀全的乌托邦也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神秘的儒家公羊学派的传统。

总之，人们都同意，了解这次叛乱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首要条件，但人们却很少对它有一致的看法。其所以这样，部分地是由于——用马克·布洛克的说法——对原因与条件的混淆。很明显，鸦片战争后南部中国的社会混乱“引起”了动荡的发展。同样明确的是，西方的冲击“决定”了那一次发展的形式。不管哪一种情况，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鸦片战争以后的头20年的广东。

我们很了解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它已被人们详尽地研究过了。它的商馆、公行、总督，在游记、官方的档案及外交史中，都有过记载。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军队的无能而躁动不安，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庭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

望和运动。

当然，并不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而且，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①在伦敦白厅^②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结果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这一分析单位有着其内部的一致性。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

① 巴麦尊 (Palmerston)，英格兰第二帝国时期最著名的帝国主义者，曾担任首相和外交大臣，奉行内部保守、对外扩张政策。——译注

② 白厅 (White Hall) 是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这条街及其附近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英国政府机关，因此人们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

第一部分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

第一章 三元里事件

虎门沙角长城坚，元帅气傲自云贤。
黑夷卷席入平地，炮火夜落城楼前。
苦战身死关将军，坐视不救谁能怜？
广州妇女哭向天，白骨遍地群羊眠。

孙衣言，摘自《鸦片战争文学集》

1841年春，中国与英国隔着巨大的广州港互相对峙着。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年，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和谈判失败的年份。1月，英国人对虎门要塞发动了又一次进攻，使中方损失了500人、两座炮台和大部分战船。满人琦善看到，除了商议停火之外别无他法。《穿鼻草约》使英国人获得了香港、600万赔款和直接同广州的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权利。但是不论北京还是伦敦，对这个结果都不满意。不过，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上尉，仍努力坚持草约中的立场，直到2月26日中国新的防御措施激起英国人的又一次进攻为止。就在此时，琦善被皇帝的侄子、较为好战的奕山所代替。英军又占领了虎门要塞的炮台，老提督关天培壮烈牺牲，奕山的副手杨芳还是力图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消灭夷人。与

此同时，双方再次举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会谈。英国军队越来越不耐烦，逐渐逼近广州城。1841年3月18日，他们占领了商馆。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威胁，广州的中国官员同意恢复与英国通商。^①

3月份休战后，又有两个月审慎的监视和等待。中国官员们试图恢复他们被粉碎了的防线。琦善曾解散三分之二的水师以图节省开支，现在当局下专令征集“水勇”。在人口密集的东南与西南城郊，设置了特殊的防栅。还建造了炮艇，在佛山铸造了一门万斤大炮。援军从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开来，使本地的守备力量达到45000人。另外还训练了36000名乡勇。^② 义律上尉及新到任的军队司令、陆军少将卧乌古爵士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这

① 关于这些事件的可靠的报告如此之多，以致几乎不必要列举它们。我所依据的部分材料如下：H. B. Morse（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冲突时期，1834—1860》，朗文出版社，1910年，第10章；Edgar Holt：《鸦片战争在中国》，普特南出版社，1964年，第9—10章；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第1—2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W. H. Hall和W. D. Bernard：《复仇神号在中国以及该国的新近战争史和香港殖民地的情况》（以下简称《复仇神号在中国》），伦敦，1855年；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46、17/48，“1841，中国，义律上尉、约翰生、马礼逊的报告”，“1841，中国，3月25日—8月，全权公使的报告”；英国国防部档案W01/461，“中国香港和印度，1841，军事”。

② Yen-yü Huang：《叶名琛总督和广州事件，1858—1861》，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6卷第1期，第46页。夏燮：《中西纪事》，第6卷，台北，1962年，第10页。梁廷枏：《夷氛闻记》，第3卷，1874年。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名著的版本没有页码，所以我只能注明卷数。（此书各种版本内容有异同，以下关于此书的注一般均为作者所用之版本。——译注）E. H. Parker：《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上海，1888年，第32—37页。史澄：《广州府志》，第81卷，1879年，第35页。《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

一切。^①到5月初，双方都认识到又一次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中国人则加速其到来。杨芳本想等到更多的援军再开始行动。但渴望取得一次辉煌胜利的奕山，在5月21日晚间就密令他的炮船袭击正停泊在城外的英国舰队。^②随之发生的水战状况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在以后几天中，英国人击沉了71艘中国船，拆除了沿岸炮台，将水边地区夷为平地。但是，广州市中心仍未受到重大打击。尽管英国人在1840年占领了舟山，广州人仍认为如果夷人打算登陆，那么他们是打不过汉族和满洲步兵的。英国人也认识到，仅仅取得水上胜利是不够的，帆船、炮船、炮台等等，都可以重新修造。让这个城市屈服，才是他们最终要做的。5月25日早晨，当奕山准备迎战从南边来的敌人时，卧乌古将军的一支由印度及英国士兵组成的部队却乘坐新造的“复仇神”号在广州的北边登陆，穿过稻田，向东进军，占领了广州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使得这些高地下方的广州城尽在其掌握之中。^③

5月27日早晨，当卧乌古正要离开营地，命令他的部队向广州城墙发起进攻时，一个信使追上了他，交给他一封义律上尉的信。广州知府余保纯已正式同意缴付600万银元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所有的外省军队在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义律已答应不破坏城市。卧乌古应中止进攻，并保持英国军队在高地上的阵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1，1841年5月13日。

②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1—32页。

③ 中国人有关奕山盲动妄进和英军进攻战略的论述，见《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2—33页；《中西纪事》，第6卷，第10页。关于复仇神号，见《复仇神号在中国》，第89—190页。

地，直至条件得到履行。^①

将军很生气，马上回了一个口信：“你使我们置身于最危险的形势之下。我的士兵们不断被侵扰，我同后方的联系受到威胁，护卫队遭到袭击。我的部下必须继续观望，以免遇到更可怕的麻烦。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中国人，我则不，也不认为可以有任何松懈。”^②

这时，三元里事件的舞台已经搭设好了。

1841年5月底，在那闷热、压抑的一周里，英国军队同痢疾、热病作着艰苦斗争，从高地上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广州城。在他们的下方，伸展着11世纪的城墙。城墙周长6英里，高25英尺，厚20英尺，有16个城门，还有分散的塔楼。城墙后面就是旧城，那里有满人驻防区、巡抚衙门、金库、武器库和用花岗石铺成的狭窄的街道。旧城南边，有一长方形的地区，那是新城。它有自己的城墙，城内有总督衙门。城墙之外，向远处铺展着一片商业区。这里分布着货栈和富商住宅，一直延伸到河边及商馆地区，跨过河流伸入河的南岸。

这个城市人口很多——至少有50万人。^③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

^① Henri Cordier:《广州的公行》，见《通报》，第2卷第3期，第284页。《中西纪事》，第6卷，第10页。英国外交部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 FO17/46，“义律给阿伯丁的证书”，无发送编号，1841年5月25日。这次行动是官方同意的，见英国外交部档案 FO682/912，“道光二十一年4月7日奕山授权广州知府赎买广州城文件抄本”，原文是中文。

^② Robert S. Rait:《陆军元帅卧乌古子爵一世的军事生涯》（以下简称《卧乌古子爵》），第1卷，康斯特布尔出版社，1903年，第193页。

^③ 据说，广州城1908年时有590847名居民。据25年后的城市人口调查，数字已上升至1122583人。见《支那省别全志》，东京，1917年；《广州指南》，1934年，第15页。对广州人口的总论，见附录1。

的农民^①，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等各种药材。

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这里有67000名男人、妇女、儿童从事织棉布、丝绸和锦缎的工作。^② 还有的工人生产粗糙的瓷器、劣质的玻璃，然后从水路把它们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大的珠宝商号加工制作宝石、玛瑙、黄玉、珍珠——一年可赚几百万元。木匠们制作上好的玩具和家具。从南方进口的象牙在这里被雕刻成复杂而奇特的形状。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收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排出来。原料经过加工，价值变得更高了。

在珠江南边的区域，城区与富饶的三角洲地带和顺德县的冲积平原联成一气。顺德县的北端差不多都是些小岛，与珠江的无数条支流互相交错着。在更南边，则是世家大族的居住区，他们的子孙多在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任职。在这一片士绅住宅的周围，

① 一个木匠挣7先令。小孩子挑拣茶叶，每天可得3便士。顺便提一下，半个地球以外的英国，铁路小工每天也只挣5先令。当时城里的非熟练工人数字已无法估计。100年以后，广州只有4万名劳动者，占男性居民的5%。见Edward Bing-shuey Lee:《近代广州》，上海，1936年，第93页。《中国丛报》，第4卷，第193页。C. R. Fay:《十九世纪的劳动与生活》，剑桥大学出版社，1947年，第174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来新夏:《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1958年，第114页。

② 这个地区的生产者仿照欧洲人纺织，比中国其他地区更有效，成本更低。大多数纺织是个人从事的，纺好后就把棉纱出售给大包买商。较大规模的纺织企业很少见。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1839年1月10日。